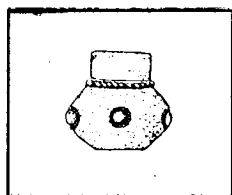


渤海国 及其俄罗斯 远东部落

●Э.В.沙弗里库诺夫 等著

● 宋 玉 彬 译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序

本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国渤海历史、考古学界的研究者们以历史的责任感为己任,以严肃、认真和科学的态度,投入了沉寂多年的渤海国研究之中。一时形成了由国内外著名的老一辈学者、专家带头,大批中青年学者为骨干的强有力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连续奋战了七八年的时间,向国内外学术界推出了一大批关于渤海的历史、政治、民族、考古及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专著、论文和考古学报告等。这批成果的数量之多、学术水平之高,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标志着中国的渤海研究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时期,关于渤海的国外研究状况,尤其是苏联远东地区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被陆续介绍到中国。

由于关于渤海的历史文献比较缺乏以及考古学的研究成果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等客观情况,到了 80 年代后期,中国的渤海研究相对有所减少,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渤海研究的未来和发展,“希望在田野上”。也就是说渤海考古学的进展如何,是渤海研究的关键。当然,这首先是将希望寄托在本国的考古学研究方面。同时,对周邻国家,尤其是与渤海当时的领土疆域有关的国家,对那里的渤海考古学研究,也寄予厚望。俄罗斯远东地区则是备受关注的地方。

1994 年冬,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正式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几位俄罗斯学者访问了其所。在俄罗斯学者带来的学术成果中,《渤海国及其俄罗斯远东部落》一书格外引入注目,这就是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由多位从事渤海考古学研究的俄罗斯学者集体撰写

的著作。写作这部书的目的，用书中的引言的话说：“根据文献史籍及考古学考察的研究成果，揭示渤海在周邻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中的角色和作用，以及渤海在远东地区通古斯语族民族未来命运中的地位，是作者所面临的任务。”作者遵循这一写作原则，将多年来所获取的考古学资料进行了整理，著作具有学术性、资料性和可读性。

如何将俄罗斯考古学家的学术成果及时、科学、准确地翻译过来，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要求译者要有扎实的考古学基础理论，并有较丰富的考古实践所取得的经验，尤其是要对渤海考古的各种遗存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译者还要对原著作者所从事的考古及取得的成果有相当深入的掌握。只有这样，加上过硬的外语功夫和勤奋才能完成一部出色的译作。

本书的译者宋玉彬同志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青年考古学者，该同志在大学受过严格良好的考古学基础教育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参加我所工作后，积极参加田野考古工作，尤其对我省东部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朝鲜北半部沿日本海一带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各类遗存都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从90年代初起，便立下决心要承担起翻译和研究渤海考古的任务。为此，该同志刻苦钻研俄语，经过短短的几年努力，将自己的俄语水平提高得很快，为了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他曾到俄罗斯远东黑龙江下游参加由俄罗斯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还到海参崴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因而，具备了一定的俄语语言汉译的能力，在此期间，该同志还不断地将篇幅不长的俄罗斯学者的论文翻译过来，使自己受到锻炼，翻译水平和技巧更加成熟。正是由于宋玉彬同志具备了翻译专著的条件，因此，1994年所里决定将本书的翻译工作交给他，希望他尽快地高质量地完成。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中文版的本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我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一是祝贺宋玉彬同志在翻译工

作的道路上又迈出坚实的一步；二是本书的学术价值一定会受到中国学者的肯定，会对我国的渤海研究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此欣喜之余，利用本书出版的机会，还想说几句，那就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有 18 个年头了，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抓住历史的机遇，在相当好的社会环境下，多读些书，钻研自己的业务，是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正道。但令人忧虑的是，在我们的周围，还有一些人被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搞昏了头，变得浮躁。一句话，坐不住冷板凳。学问是需要一代代传下去并得以发展的，没有一点踏踏实实的精神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从宋玉彬同志几年来的成长和翻译本书过程所尝到的各种滋味，从中是可以悟出一些道理来的。

王 侠 1997 年 7 月 25 日于长春

目 录

序	王 侠 1
引 言	1
第一章 渤海国(698—926年)	27
第一节 渤海国建国前远东地区的民族政治状况	27
第二节 渤海国政治历史概述	40
第三节 渤海国的行政体制	47
第四节 渤海国的社会制度	55
第二章 渤海地区的渤海文化考古遗存及其评述	63
第一节 关于滨海地区渤海遗存的分类	63
第二节 城址与村落址	65
第三节 墓地	86
第三章 渤海时代滨海地区居民的物质文化	89
第一节 房址与宗教设施	89
第二节 农业经济与猎取业	111
第三节 手工业	120
第四节 交通工具与对外联系	189
第五节 武器	193
第四章 渤海文化	198
第一节 渤海文化的总体特征	198
第二节 装饰造型艺术 宗教观念	201
结 语	228
文献索引	233
后 记	255

引 言

渤海国(公元698—926年)的疆域包括现今滨海边疆区、北朝鲜以及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它是由古代通古斯语族的姆克利部落创建的,该部落在中文史籍中被称为勿吉、靺鞨,这是基于它们社会经济的连贯发展(参考文献200,第60—61、68—69页)。渤海国的历史与远东及中央亚细亚地区中世纪国家、部落联盟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上述地区的许多事件中,渤海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积极的作用。

从这方面看来,不同国家的学者对渤海国历史、文化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遗憾的是,中国、日本历史史籍中保存下来的有关渤海国的记载,比较片面且不完整。正因为此,考古学研究所揭示的发生在渤海国境内的社会经济、政治、民族文化进程,以及渤海国对周邻国家、民族的影响,特别是对渤海国的后继者渤海—女真人进一步发展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滨海地区渤海遗存的研究史,在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А.П.杰列维扬科(参考文献137,第7—25页;文献143,第44页)、Э.В.沙弗库诺夫(参考文献197,第6—15页)、Л.Е.谢缅尼契科(参考文献163,第2—3页)的著述中得到了阐述。尚是在革命以前,研究者们就已经开始研究渤海史,揭示中世纪的考古遗存。最早的旅行者、考察者们注意到了滨海边疆区境内的城堡、城墙、濠沟、道路,М.维纽科夫对此写道:“毫无疑问,在各种情况下,众多的城市借助于土筑的工事实现了防御”。(参考文献45,第154—155页)这些阐述唤起了人们对遥远的、较少研

究的俄罗斯边陲的天然兴趣。

19 世纪时期，特别是在其后半期，由于远东开始了繁忙的开发，人们对该地区考古学的兴趣明显增长。俄罗斯中心派往远东的考察团成员多半受过技术教育，他们对考古学遗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有关考古遗存位置、最初的原始状态的记述，为学术界留下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在矿业工程师 И. А. 洛巴金有关滨海地区、黑龙江沿岸、萨哈林岛考古遗存的手稿中，记载了上述地区考古遗存的位置，其中包括属于渤海时期的遗存（参考文献 220，第 3—32 页）。

1870—1871 年，俄罗斯地理学会向南乌苏里斯克边疆区派遣了专业的历史—民族考察团，考察团由杰出的俄罗斯东方学家帕拉季·卡法罗夫率领。帕拉季·卡法罗夫的主要研究成果是首次深入地研究了滨海地区中世纪遗存的分期，其基本理论至今可信。按照 И. 卡法罗夫的观点，滨海地区中世纪考古遗存应该断代为渤海时代（8 至 10 世纪）、女真时代（12 至 13 世纪初期）、蒙古统治时期（13 至 14 世纪）（参考文献 146，第 91—92、94—96、124、326、364 页）。И. 卡法罗夫领导的考察团的工作成就，对远东而言意义是重大的。他们首次对边疆区进行了有计划的考察，这里发现的考古遗存和具体的时代建立了联系：“分散在南乌苏里斯克边疆区的古代遗迹，主要是属于位于满洲的渤海王朝统治时期”。（参考文献 146，第 95 页）同时，И. 卡法罗夫广泛地参考了文献史料，因此他的著述为后来开展的远东地区有计划的考古学考察提供了可信的依据。

根据文献记载，И. 卡法罗夫推测，在现今克拉斯基诺村附近存在一个海港遗址（参考文献 146，第 94 页），遗憾的是，他没有指出文献的性质和名称。后来，在这一地区的确发现了一座不大的渤海城址，并且完全可能是一处海港，因为该城址位于埃克斯

佩季齐亚海湾楚卡诺夫卡河入海口附近的海岸上(参考文献 195, 第 141—144 页; 参考文献 197, 第 94—95 页)。

综上所述,可以确认 П. 卡法罗夫是最早的渤海遗存研究者,根据实际材料他证明了在滨海边疆区境内存在渤海文化遗存。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П. 卡法罗夫和 В. 戈爾斯基一样,他们错误地认为,远东民族国家政权早期形式的确立受到了来自朝鲜、中国的影响(参考文献 55, 第 24 页)。

俄罗斯东方学家们在远东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精选、翻译、综合中文、朝文、日文献史料中有关西伯利亚、中央亚细亚、远东民族的记载方面,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应该注意到,史料的内容并不都是全面的、客观的记载,但对于研究渤海史、金史来说,它们是当时唯一的资料。

19 世纪中期,出现了 Н. Я. 比丘林(参考文献 18—20、81)、В. 戈爾斯基(参考文献 55)、В. П. 瓦西里耶夫(参考文献 42)的著作,根据文献史料,在著述中他们论述了远东及其毗邻地区民族的古代史、中世纪史。在他们的著述中,部分地涉及了渤海国的历史(参考文献 19, 第 136 页; 文献 42, 第 31 页)。

由于俄罗斯东方学家们的工作,论据充分地解释俄罗斯远东地区中世纪遗存的属性和出现的时间才成为可能,不过,由于缺少考古学材料,当时无法核查文献资料的可信性。

1884 年,阿穆尔边疆区研究会成立,它成为当地历史学家、方志学家、东方学家全面研究远东南部地区力量的组织者,Ф. Ф. 布谢主持了该研究会的工作,他和 Г. Д. 马尔科夫、В. П. 马尔加林托夫、Л. А. 克罗帕特金一起,按照学术团体的办法着手远东地区的考古学研究。

Ф. Ф. 布谢收集了大量的有关边疆区古代史和考古学的资料,这些工作使他得以对已知的考古学遗存进行分类,并对滨海

的古代史进行了初步的分期。Ф.Ф. 布谢把中世纪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1. 渤海国存在时期;2. 女真人金王朝统治边疆区时期;3. 蒙古人侵入和统治时期;4. 满洲人远征时期(参考文献 40, 第 3—5 页)。

1908 年, Л. А. 克罗帕特金发表了《阿穆尔边疆区古代遗迹》(参考文献 41), 为已有的资料补充了新的信息。在著作中, 援引了一些首次发现并加以扼要的叙述, Л. А. 克罗帕特金对滨海地区考古遗存进行了更加充分的综合报道。

20 世纪初期, В. К. 阿尔谢尼耶夫对边疆区中世纪考古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和调查, 他对 200 余处考古遗存进行了记述(参考文献 12, 第 13—15 页), 为远东地区组织考古学考察和历史方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В. К. 阿尔谢尼耶夫在其所著的《乌苏里斯克边疆区古代史资料》一文中(参考文献 12, 第 15—66 页), 他触及了一些中世纪考古遗存出现的时间及其用途的问题。不过, 由于一系列原因, 与 Ф. Ф. 布谢的分期相比, 他提出的分期退步了。В. К. 阿尔谢尼耶夫认为, 渤海国的存国时间为公元 668 年至 12 世纪, 女真帝国的存国时间为 12 世纪至公元 1386 年(参考文献 14, 第 313—318 页)。他认为契丹是靺鞨部落之一。中世纪时期远东民族国家政体的形成, 按照他的观点, 不是靺鞨部落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而是由于来自更文明的邻邦的外界影响, В. К. 阿尔谢尼耶夫也是这样看待渤海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参考文献 12, 第 281、283 页; 文献 197, 第 8 页)。尽管暴露出某些不足, 但 В. К. 阿尔谢尼耶夫在远东古代研究方面的学术活动对后来历史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А. З. 费多罗夫和 В. К. 阿尔谢尼耶夫一起以极大的热情献身于滨海过去的学术研究, 1916 年, 他出版了《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市及其周邻地区的古代遗存》一书(参考文献 183)。在

著作中，A.З. 费多罗夫记述了其本人在乌苏里斯克市及其周邻地区发现的中世纪遗存，并绘制了遗存的平面图。需要指出的是，今天我们对一些渤海遗存的认识得益于 A.З. 费多罗夫的研究，因为由于基本建设，这部分遗存现在已经荡然无存。A.З. 费多罗夫在市区里进行的发掘表明，市区内存在渤海时期的遗存（参考文献 183，第 11—14 页）。

1915 年，在庆祝阿穆尔边疆区研究会成立 25 周年大会上，东方研究院教授 A.В. 戈列别什科夫作了题为“依据考古学资料对阿穆尔边疆区的研究”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根据中国、日本的文献史料分析研究了远东民族的历史，并对考古学的基本工作进行了评述，其中他特别赞扬了 Ф.Ф. 布谢的工作（参考文献 56，第 50—75 页）。

综上所述，在革命以前人们已经开始了解远东地区的考古学遗存，对考古学遗存进行了最早的记述，并开始对已有的信息进行概括尝试。考察者们研究了遗存的分类问题，并对遗存进行了分期。东方学家花费很大精力研究文献史籍，并解决了滨海边疆区曾作为渤海国组成部分的问题。同时，他们认为，渤海国的形成和渤海文化的形成一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受到了来自更文明的邻国朝鲜、中国的强烈影响。

其实，在资产阶级文献中牵扯渤海国形成原因的这种解释，也存在于目前的著述之中。这些问题在 A.П. 奥克拉德尼科夫（参考文献 140，第 158—174 页；文献 139，第 44—57 页）、Э.В. 沙弗库诺夫（参考文献 197，第 13—14 页）和 Л.Е. 谢缅尼契科（参考文献 225）的著作中得到了足够充分的阐述。

进入苏联时期，1929 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出版了 З.Н. 马特维耶夫的著作《渤海》（参考文献 129）。在著作中，作者利用当时已知的中国、朝鲜、日本的文献史料对渤海国的地理位置、政

治历史、社会制度、文化，渤海国与周邻国家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述。在结语中，З.Н. 马特维耶夫强调指出，渤海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王国。同时，他对滨海地区的渤海遗存进行了论述。不过正如后来的研究所证明的，З.Н. 马特维耶夫对部分遗存的断代是错误的。正如З.В. 沙弗库诺夫指出的：“……З.Н. 马特维耶夫翻译的古代文献史料，许多地方不够准确，存在遗漏并缺少文献的出处。”（参考文献 197，第 9 页）尽管如此，З.Н. 马特维耶夫的著作是以往时期有关渤海国政治史最全面的著述。

1953 年创建了以 А.П. 奥克拉德尼科夫为首的远东考古学考察团，1954 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成立了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部历史、考古、民族部，从此之后，开始了苏联远东南部地区中世纪遗存有计划的考古学研究。

在远东分部历史、考古、民族部科学研究员 Э.В. 沙弗库诺夫的领导下，考察了夹皮沟河河谷（克罗乌诺夫卡河）的两处佛教寺庙址和几座渤海的墓葬（参考文献 228—230）。随后发表的有关报告首次导致了对于渤海时期材料报道的学术转变。例如，屋顶瓦材料（参考文献 191，第 173—186 页），在东京城材料发表以后（参考文献 136，第 198—214 页），它成为渤海遗存确认和断代的标尺。中世纪时期的瓦曾进行过分类研究，同时进行了勾勒渤海城址特征的尝试（参考文献 194，第 105 页）。在一些初步断代为渤海时期的中世纪城址里，如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丘古耶夫斯克城址、萨因巴尔斯克城址、南乌苏里斯克城址，进行了勘测发掘，以便于对它们进行准确的断代（参考文献 194，第 102 页）。П. 卡法罗夫预言的城址——克拉斯基诺城址被发现（参考文献 211，第 38—40 页；文献 195，第 141—144 页），近年来，该城址始终是远东考古工作者长期考察的客体（参考文献 216、217）。

1968 年出版了 Э.В. 沙弗库诺夫的著作《渤海国及其滨海地

区的文化遗存》(参考文献 197),根据文献史籍的记载,作者分析研究了由姆克利(鞑靼)部落到渤海国成立的历史。Э.В. 沙弗库诺夫分析了独立国家渤海国的创建过程、渤海国的政治、渤海国与周邻的相互关系、渤海国的行政体制与居民、渤海的经济、渤海崇高独特的文化。该著作的大部分篇幅涉及滨海地区渤海文化遗存的评述,这些遗存是作者最初从 50 年代开始进行的研究。当时全面发掘了两处佛教寺庙址、五座墓葬,其中获得的主要遗物是瓦、容器、宗教用品。通过分析材料,并与中国东北类似遗存加以对照比较,确定了滨海城址在远东南部地区的分布范围。

苏联远东中世纪史问题在集体撰写的《西伯利亚史》中得到阐述(参考文献 89,第 307—320 页),在 Э.В. 沙弗库诺夫执笔的有关渤海国的章节里,分析了渤海国创建的先决条件,论述了渤海国的政治史和行政体制,同时强调,渤海国这个古代通古斯语族国家文化的形成渗透着与周邻国家、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作者强调,渤海国这个独立王朝的存在,对苏联远东南部地区后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参考文献 89,第 320 页)。

60—70 年代对这样一些渤海遗存进行了考古学考察,如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参考文献 218、222、223、231、232、235、236)、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参考文献 233,)、尼古拉耶夫斯克 1 号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参考文献 212—214)。

70 年代,在汇编《考古发现》中,关于滨海地区渤海城址的报道发生了学术转变,发表了一批最有意义的材料,对已知的、明确断代的遗存中出土的陶器材料进行了对比研究(参考文献 30、31、158、159、166)。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1 号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参考文献 26,

第 17—21 页；文献 32，第 57—63 页），远东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街坊区和生产作坊址。导致了学术转变的考古学材料，使我们得以更准确、更充分地复原手工业者、农耕者、猎户、渔户的日常生活，重建滨海地区渤海城市、村落居民经济活动的主要部门。

通过把考古学材料和周邻地区的材料加以广泛的对照比较，比较房址，运用文献史籍的记载，确立了滨海地区渤海文化的分期。根据发掘成果，把渤海文化划分为早、晚两期（参考文献 32），并细致地研究了渤海文化的地方性变异（参考文献 163，第 18—22 页），这种变异在渤海人房屋营建习俗方面表现得相当明显（参考文献 16，第 87—88 页）。

众所周知，陶器是种类最丰富的遗物，对渤海的陶器进行了显微镜、物理力学、岩石学的分析研究（参考文献 79，第 55—67 页）。Л. Е. 谢缅尼契科的文章论述了渤海人制陶业发展的问题（参考文献 164，第 47—57 页），在文章中她分析研究了手制陶器的纹饰，并按用途对其进行了分类。轮制陶器也进行了这样的分类研究。在 О. В. 吉亚科娃、В. И. 鲍日金的文章里，论述了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的轮制陶器的纹饰（参考文献 72，第 114—118 页），将该城址的陶器同滨海地区其他渤海遗存中出土的陶器以及黑龙江沿岸中世纪遗存中出土的陶器，进行了纹饰、形制的比较，黑龙江沿岸中世纪遗存中出土的陶器不同于滨海地区女真人的陶器，发现了一些相似物。

很有意义的是，根据克拉斯基诺城址提供的发掘材料，В. И. 鲍日金、А. Л. 伊夫里耶夫撰写了渤海国制瓦生产的文章。在克拉斯基诺城址，与瓦顶的佛教寺庙址并排，发现了目前滨海地区唯一的制瓦窑。作者们发现该窑址和契丹时代（11 至 12 世纪）的窑址设施存在相似性，同时，他们还对 9 至 10 世纪初期渤海国制瓦生产的过程进行了模拟尝试（参考文献 29，第 142—151 页）。

近年来的考察为了解认识渤海人的陶器生产补充了材料，在科尔萨科夫斯科耶村落址，揭露了三座陶窑遗迹，获得了展示滨海地区渤海人经济活动的独一无二的材料（参考文献 216）。按照构造结构，这些窑址接近克拉斯基诺城址的制瓦窑。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1 号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发现的四座陶窑废墟是制陶综合体遗迹，它们属于上层建筑平面（参考文献 214，第 91—92 页）。

还有一种物品是用泥土制作的，它就是纺轮，几乎所有的渤海纺轮都是陶质的。需要指出的是，纺织在渤海人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文献史籍记载证明了这一点。Н. Г. 阿尔杰米耶娃著文对纺轮进行了评述和分类，她认为，渤海的纺轮同以往时代的纺轮在形制上相近（参考文献 154，第 98—106 页）。

В. И. 鲍日金、Л. Е. 谢缅尼契科的文章分析了渤海农业经济的问题（参考文献 22—24；文献 165，第 66—70 页），在发掘大多数渤海遗存的过程中，见有农业劳动工具，它们证明了渤海人农耕业的发展，农耕业的发展与饲养业处于紧密依存之中。随着材料的积累，В. И. 鲍日金在分析研究考古学资料、民族学材料的基础上重建了渤海人农业、饲养业的经营方式（参考文献 23）。除此之外，在分析骨学材料的过程中，鲍日金构拟了当时动物群的构成，并推测了哪些野生动物是渤海人的狩猎对象（参考文献 4）。复原渤海时期居民的经济、地理的工作开始了（参考文献 27，第 84—87 页）。

冶金业发展的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参考文献 116，第 96—103 页），他们研究了有色金属制品生产的制作工艺问题（参考文献 101，第 40—41 页）。

Э. В. 沙弗库诺夫、Л. Е. 谢缅尼契科的著述，牵扯到渤海人的民族文化联系问题（参考文献 197；文献 161，第 88—98

页)。他们分析研究了陶器、瓦、武器、装饰品,探索了滨海地区渤海人房址的结构特征,并把渤海的房址和靺鞨的房址加以对照比较。随着考古学材料的积累,我们得以揭示靺鞨人和渤海人物质文化中存在的共同因素,并深入研究渤海文化与高句丽国、回纥人、契丹人文化的联系。O. B. 吉亚科娃在自己的文章里,分析研究了渤海人制陶业中的靺鞨传统(参考文献 70)。

渤海人军事技能的发展问题同样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Л. E. 谢缅尼契科对渤海人的镞进行了评述(参考文献 162,第 98—117 页),揭示了 5—11 世纪时期滨海地区、黑龙江沿岸居民在文化上的相似性。不过,正如后来在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进行考古学考察所判明的,Л. E. 谢缅尼契科对该城址中层堆积的断代是错误的,她认为中层堆积是渤海时期堆积,实际上应该把它断代为女真时期。结果,某些女真类型的镞被她当作渤海的镞而加以分类。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对待房址的问题上,Н. Г. 阿尔杰米耶娃犯了类似的错误。

1982 年,Л. E. 谢缅尼契科进行了题为“渤海时期(8—10 世纪)滨海地区居民的物质文化”的副博士论文答辩,这是对渤海国时期滨海地区普通的手工业——农业居民的物质文化进行的首次尝试性研究(参考文献 163)。

研究者研究了渤海工匠的玻璃制品,分析了远东地区中世纪居民玻璃制品生产的发展水平(参考文献 170,第 116—129 页;文献 171,第 41—42 页)。

有关渤海的研究,还涉及了滨海地区渤海人的宗教观念问题(参考文献 141,第 47—52 页;文献 207,第 113—119 页)。

在分析研究滨海地区渤海遗存中出土的源自中亚的考古学遗物的基础上,Э. B. 沙弗库诺夫得出结论,中世纪时期,滨海地区与中亚地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商贸联系(参考文献 203,第 146—

155 页)。Э.В. 沙弗库诺夫还深入地研究了滨海地区中世纪的遗存,并做了缜密的分期和分类(参考文献 199,第 186—191 页),他把中世纪遗存划分为四个历史文化时期,7—10 世纪的遗存属于第一阶段,此时的滨海地区为渤海国的组成部分。

滨海边疆区境内开展的有计划的考古学工作,积累了大量的实际材料,为重建渤海人的某些经济部门和他们的生产活动提供了可能。同时,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注意,生产力的发展是创建拥有崇高独特文化及政治独立性的早期封建国家渤海国的先决条件。

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为正确地阐释滨海地区中世纪的考古遗存,复原渤海人的经济与文化,尤其是重建渤海国的历史,要求研究者们应经常运用文献史料,并把它们同考古学研究成果加以对照比较。同时,不能不留意中国、日本、朝鲜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有关渤海历史、渤海物质文化遗存的研究成果。基于此,下面我们将研究分析一下有关渤海国历史与文化的主要文献史料以及国外研究者的学术著述。

有关渤海国的文献记载,只是在与渤海国毗邻的中国、日本、朝鲜的文献史籍中得以保存下来。公元 945 年,刘昫主持编撰了《旧唐书》,公元 1060 年,欧阳修主持编撰了《新唐书》,在这两部中国朝代史中,保存了有关渤海国最丰富的记载。在这两部史书中,有单独的《渤海传》。同时,在《新唐书·渤海传》中,使用了未流传下来的张建章所著的《渤海记》的一些记述。张建章是瀛洲司马,他于 833—835 年出使渤海,据此,在《渤海记》中详细地记载了渤海国头十位执政王的年表、封号、执政年号、渤海国的行政区划、官制和等级制度。此外,还记载了渤海国的一些产品(参考文献 290,卷 19,第 24 页)。另外,11 世纪初期,以王钦若为首的集体编撰了《册府元龟》,该书也汇集了有关渤海国

的记载。公元 1344—1345 年，元代的脱脱主持编撰了《辽史》、《宋史》，在这两部史书中，以及更早成书的洪皓的《松漠纪闻》、叶隆礼的《契丹国志》中，记载了在契丹人的猛攻下渤海国灭亡以及渤海国灭亡后渤海人的命运。

日本官方的编年史《续日本纪》、《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以及公元 892 年编撰的《类聚国史》，11 世纪编撰的《日本纪略》，记载有渤海国的情况，但在材料方面它们比中国史籍的记载显得更加贫乏。日本史籍记载了渤海早期的居民点，渤海使团出使日本，日本与渤海的经济、文化联系等等真实情况。在我国的文献中，有关渤海的日本编年史材料最早反映在 3. H. 马特维耶夫的著作《渤海》中（参考文献 129，第 21—28 页）。1950 年，在日本发现并发表了公元 841 年渤海使团出使日本的国书，国书中记载了使团成员及其职务名单，在签署国书的官员中提及一名显贵大虔晃，后来他成为渤海国的国王（公元 857—872 年）（参考文献 242）。

朝鲜中世纪时期的史籍《三国史记》（公元 1145 年）、《三国遗事》（13 世纪末）中有关渤海的记载，主要是从更早编撰的中国史籍中获得的资料。不过，这两部史籍中也有一些不见于其他文献的记载，所记载的一部分事情发生在朝鲜本土，涉及新罗与渤海、新罗与靺鞨之间的关系，以及契丹征服渤海后渤海人逃亡高丽等情况。另有一部分记载得之于未流传下来的中国史籍，记载的内容涉及渤海国的历史地理，以及渤海学者赴唐朝应考等情况（参考文献 276，第 24—25 页）。

需要指出的是，与渤海国毗邻国家的文献史籍是其自己时代的产物，这些史籍无法避免主宰这些国家的中国传统的帝王权观念的影响，按照这一观念中心国的皇帝统治着全世界，而在这个中心世界周围分布的“蛮夷”帝国，在良好的开化文明的影响